

苏北人与淮夷：同一片地域的两次族群建构

徐 峰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运用族群理论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的人群、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进行了重建。作为过渡地带的淮北、江淮地区在历史上见证了两次相似的族群建构,一次是西周时期的淮夷,一次则是韩起澜论述的苏北人。两者都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形成的,前者相对于西周王朝,后者相对于上海,族群的建构中,移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情境。

关键词: 苏北人;淮夷;族群建构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3)02-0089-03

同一片地域在历史的两头却发生过两次族群建构。这是笔者在读完美籍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核心感受。该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译本则是2004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虽然读评的有点晚,但是却想将该书内容与笔者近年关于淮夷的研究作番比较,从中庶几可以体会到漫长历史时间中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地理结构。

族群的研究,在以往的认识中,就国内而言,更多地与诸如古代传统的四夷,或者今天边疆地区的彝、藏、羌等少数民族有关。韩起澜可谓视角独特,她对苏北人研究源于她对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城女工之间分裂与对抗的观察。美国城市更为国际化、更普遍的移民现象给了她灵感和动力来探讨苏北人是如何成为了上海的“他者”。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运用族群理论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的人群、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进行了重建。

对于族群的认识有很多个视角。传统的一类是通过语言、文化、血缘等共同的历史渊源或相似的文化特质这些所谓客观要素而产生族群的认同,又称“根基论”;另一类简称“工具论”,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虑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

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的、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①。族群认同并非完全在共同的历史渊源或相似的文化特质这些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1]。理由很简单,族群认同是个可选择的、可被利用的社会生存工具^[1]。在现实中,权力、利益、奖罚、规训等众多因素均会影响到族群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这两类视角,韩起澜在书中都有采用,且明显可以感觉到,她在建构苏北人族裔的过程中,更偏向于工具论和边界在族群建构中起的作用。她首先试图给苏北下个定义,但是这并不容易,她回溯了很多学者对于苏北的界定,发现是有分歧的。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并不存在苏北的标准定义。有人将苏北限定在长江以北。有人则坚持贴近长江的,也即今天的扬泰、南通地区与它们北部地区的区别,认为从扬州以北起始才是苏北。对于苏北地理定义的不同,已然反映了在被另一个群体或地域认同的“苏北人”的内部是含有不同的身份认同的。地理在界定族群方面的失效,绕不开语言和文化的复杂。苏北人的来源地,即淮北与江淮,在地理上是一个南北过渡区,连通的结构导致了这个区域文化板块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存在。于是地理和文化并不总是一致的。试以邻江的靖江为例。作为江北的一座城

*收稿日期: 2013-02-20

**作者简介: 徐峰(1982~),男,江苏靖江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① 相关理论的综述,可参见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9页。

市,靖江在反映“苏北人”内部的族群认同时非常有代表性。靖江地在江北,可方言却是吴语,文化上也与江南近似,这源于靖江本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其居民最初是讲吴语的江南人,明朝时,该岛与长江北岸之间形成沙洲,随着该岛逐渐与北岸连成一片,吴语和江淮官话便混杂起来。尽管地理上在江北,然在这座城市的传统意识中,却长久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归吴”情节。当靖江和江阴近些年共同沿江开发、开通城际快速班车,两城的联系被拉近后,我曾两次见到靖江人的身份认同,一次是一个靖江人在城内公交上通话,她和通话人说自己正在江阴;另一次是我和一位靖江朋友在南京某饭店吃饭,她与邻桌聊天,当她被问到是哪里人时,她说她是江阴的。从中我们可以感到,身份认同在面对现实情境,如地位、利益、虚荣时,是一个可以被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二

当韩起澜从所谓“苏北”内部去寻觅苏北人时,她发现她无法达到目的。此时她需要一面镜子来照出“苏北人”。而这面镜子正是上海。韩指出,只有作为移民,他们才遭遇偏见和歧视;只有作为移民,他们才第一次被贴以苏北人的标签。在族群形成理论中,移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对于移民者本身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人群、生活方式;对于移入地原来的人群而言,他们的生活环境、资源等各项内容无疑将遭受外来者的分享与竞争。无形之中,边界便突显出来。被认为是开启族群研究新的里程碑的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便认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其“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2]苏北人南渡,大抵是因为饥荒、洪涝灾害,在清朝时,苏北难民已被江南视为无序之源,当地官员作出种种努力以遣返难民,但总难以奏效。上海开埠以来,大批苏北人移居上海。这对上海本地人以及来自苏州、无锡、宁波相对富裕的移民所代表的上海精英文化构成了一种挑战。于是横亘在两大群体之间的边界彰显出来,且有多个层次:经济生业层面,苏北人的生业被限定在了劳工和服务业;住居层面,棚户区构成了上海最不可忽视,也是最难以观瞻的风景线。棚户区主要的住居形态是草棚。韩起澜以草棚为例描绘了当时的市当局与苏北人的一次冲突;在文化层面,苏北地方戏困难地坚持着,苏北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上海的文化。相反,即便是处在边缘的地位,却仍然力图分享与竞争。通过这几个层面的论

述,韩起澜认为,苏北人作为移民,已成为族群,显然,这一族群的形成,是在移民的情境中,相对于上海而成立的。

然而,来自苏北的人有着怎样的自我认同呢?相比上海对“苏北人”的认同,韩起澜更关心存不存在苏北人内部的认同。其实在从地理上定义苏北之时已经预示了苏北人内部的族群认同。不过,她需要在上海的语境下,找寻更多的证据来进行讨论。她在承认移民造就族群的同时,又认为这个族群是有争议的。她考察了同乡会这一尤能反映身份认同的组织。但她发现所谓苏北同乡会并非总是由苏北人建立的,而且这类组织通常短命,更重要的是,来自苏北各县几乎都有同乡会。接着,她从更多文化层面来论述在上海精英集团信念里一个享有共同传统和经历的内聚力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分枝性结构。她借苏北各县的人指出,在饮食、听戏、住居、工种,甚至是劳动时喊的号子,皆有差别。甚至在苏北人内部,也存在各县之间的排斥和歧视,强调彼此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尽管苏北人在江南人眼里近似于一个族群,但对那些实际是从长江以北各市县移居而来的人来说,大苏北的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微弱的,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苏北人只是外部人强加的,集团内部之人并不认同。当然,这也反映了苏北人当时在上海的一种舆论困境下,撇开大苏北,而强调自己的原籍身份未尝不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苏北人”已经成为一种阶层话语,上海人利用这个话语来强调自身的优越;苏北各县市的人们绕开这层话语来逃避存在于上海的突兀的阶层差别。

韩起澜认为观察苏北人内部族群认同最好的一次机会是日占上海时期,苏北人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这不同于平常的偏见,而是已经牵涉到今日所谓“政治正确”。在这一个案的分析中,韩起澜为苏北人辨驳,认为这是一种预设——先已存在的对苏北人的蔑视,导致了“天下之恶皆归焉”。她特别想知道的是,这起事件是否能够激发苏北人公开宣布苏北身份的意识。她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为了反驳有关苏北人的指控,淮安、扬州、南通三个苏北居民区的同乡会成立联合办事处,发表了公告,批评有关对苏北人造成负面影响的言论。

该书分析的是1949年至1980年上海的苏北人,由于时间上与当代最为接近,所以读起来会有熟悉感,甚至有些问题仍然在延续。在这一部分,韩起澜强调苏北人的族群性仍然存在,她特别例举了作为苏北人后代的一些人刻意掩藏自己苏北籍的事例来说明无形的不平等和偏见是如何影响了上海苏北人的

生活。最令我感到有趣的是韩起澜引用的一个访谈,一个来自苏北的劳动模范被本意良好的熟人称赞,而赞颂的内容却是“苏北人哪能像你那么好?你实际上看上去根本不像苏北人”。这令他愤怒之极。上海人的傲慢与偏见以另类的方式传递出来。而当这种傲慢、偏见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海人其实也在为此买单。当代上海人经常被外地人调侃和批评,这似可看作来自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种反击。上海的滑稽戏演员、“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在他的“笑侃三十年”中说到一个段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他的一个东北朋友对他说:“立波啊!你一点都不像是上海人。”此时,不像上海人成了一种赞扬。

三

韩起澜论证的苏北人作为族群曾经的存在,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这是近现代苏北与上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近现代苏北人的族群建构比作历史的“尾”,那么同样的这片地域,早在历史的“头”上已经见证过一次族群建构。这个族群即淮夷族群联合体。一头一尾的比较,可以发现有许多相似。若将时光倒退二千多年,回到西周王朝,会发现苏北人的来源地——淮北与江淮地区,早在西周时期,当地的居民已经被族群建构过一次,当时他们同样是被作为一个“他者”,一个相对于姬姓周人的被征伐和被蔑视的对象。周人将他们统而括之,称为“淮夷”。如果说苏北人的来源地与上海的边界是长江,那么淮夷与周人的边界则是淮河,淮夷之“淮”即是地理标志。以往对于淮夷以及东夷的研究,很少注意边界、族群认同在族群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传统史学和考古工作者乐于对淮夷作无上限的上溯,甚至将淮北、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与淮夷挂上钩,这是要不得的。无论是东夷,还是淮夷,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比如有学者指出,“东夷”之概念,是在夏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及其人群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后,从华夏的角度始界定四邻,并将此种界定给予边缘地区后产生的,体现了中心的权力与优越。^[3]并不难看出,这个视角与韩起澜论证苏北人采用的是一样的,即拉康的“镜像理论”,族群是在镜子中被照出来的。无论是夷人,还是苏北人,都处在了“中心—边缘”的结构中。我曾

指出,大致从夏商时期开始,苏皖两省的淮北和江淮地区就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山东与中原的移民。进入西周时期,本居山东境内的徐和淮夷叛周失败,逃至淮河下游,驻留在苏皖淮北与江淮一带,在与周人竞争与分享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寻找和发现自身的历史记忆,逐渐形成“淮夷”族群联合体^[4]。然而这一认同并非来自他们自身,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文本,他们是在周人的文本,即金文语境中出现的。虽然他们被统称为“淮夷”,然而内部其实是由众多人群组成的,在文化上也有不少差异,同样是一个分枝性结构,这与苏北人的族群结构是极为相似的。在这两次的族群建构中,移民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情境。在族群建构的过程中,都包含了偏见、不平等以及相应的对抗。但是,苏北人和淮夷的族群建构中也有不同的地方。苏北人作为族群的形成,是因为来自淮北、江淮的人迁徙到了上海内部,与原居上海的人群,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试图分享和竞争。而淮夷的族群建构则并非如此,虽然他们与周人也有经济资源方面的竞争,但作为被轻视的一方,他们并不试图迁入中心区;相反,是周人在极力扩张,逼迫前者,试图进入他们的领地,而发生的冲突。

为什么同一片地域在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相似的族群建构,这无疑与淮北、江淮地区既是过渡带,又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心区”的外围地带有关。人群在这种地理结构中的频繁流动,很容易形成移民的情境,为族群的建构铺下了基础。赫拉克里特有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了解了苏北人与淮夷在同一片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族群建构。不禁想说:“人可以两次,甚至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参考文献:

- [1] 周大鸣.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 [2] 弗里德里克·巴斯. 族群与边界[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3] 张锐. 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D]. 未发表博士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未发表博士论文, 2010.
- [4] 徐峰. 边界与族群认同:论淮夷及其与周人之关系[J]. 中国人人类学评论, 2012, (21).

【责任编辑:黄 玲】